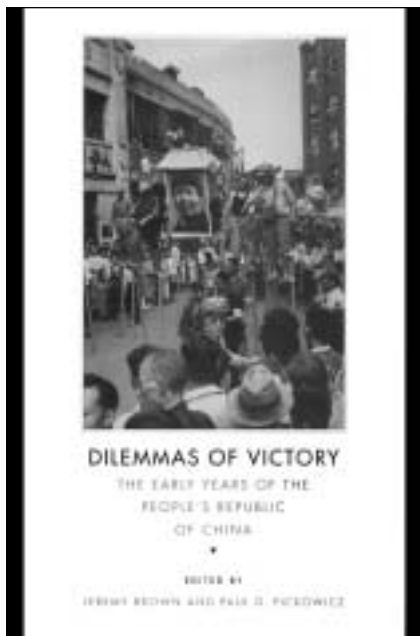


中共建國初期的新歷史

● 陳永發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這本英文書的中文名字可以勉強譯為《勝利帶來的兩難：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這是中共改革開放以

後，英語世界根據開放檔案和口述歷史資料研究1956年以前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此書雖未改變海外學者對中共建國最初七年的基本認識，卻大大豐富了我們對這一個所謂「黃金時期」的理解。主編是中國電影史學者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和他的學生周杰榮 (Jeremy Brown)，他們聚集美國老中青三代十四位中國近現代史學者開會，共同探索中國當代史這個新領域。其中老中學者都充分利用他們對1949年以前中國歷史的深厚理解，以及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所帶來的後見之明，深入觀察中共建國之初，尤其是毛澤東宣布根據馬克思主義鐵律把中國帶向社會主義階段以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①。

兩位編者認為內戰勝利為中共帶來了一個兩難局面：一方面是革命的選擇，也就是立即動員工農階級分別消滅代表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和代表封建主義的地主階級，然而社會秩序勢將因此而陷於混亂，竟致無法解決勝利之後需面對的各種困難，譬如百業蕭條、人民失業、物價上漲、財政不足，有九百

《勝利帶來的兩難》是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英語世界根據開放檔案和口述歷史資料研究1956年以前中國最重要的成果。此書雖未改變海外學者對中共建國最初七年的基本認識，卻大大豐富了我們對這一個所謂「黃金時期」的理解。

本書的重點，如編者所說，不是中國高層政治，而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學者各自選擇學術關注，撰寫論文，所以整合起來相當困難。最後勉強區分為接收城市、佔領邊陲、改造藝文和學術界，以及家庭因應政治鼎革的策略等四個部分。

萬軍隊要養；另一方面則是，倘若爭取和拉攏資產階級以及被認為依附在資產階級身上的知識份子，則勢須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抑制階級鬥爭，又不知將如何面對自己宣稱代表其利益的工農階級。理想和現實的兩個選擇之間形成兩難，中共惟有作出折衷：在農村宣傳土地改革，掀起階級鬥爭，在城市宣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建立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內部再試圖進行改造，暗中仍為整個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鋪路，也就是今天中國大陸黨史專家所說的增加社會主義因素。

中共與民更始，新中國雖然充滿新氣象，但因為強調經濟復蘇和社會秩序，所以其所謂「新中國」與其詆譏醜化的「舊中國」之間其實並非截然不同；無論是人員、制度或是做法，均與舊中國有驚人的連續性。建國之初，中共不諱言其為社會主義的信徒，然而刻意隱晦其全面消滅私有經濟部門或消滅資產階級的「長程」目標。中共號召打倒國民黨訓政，但在高唱群眾參與和民主革命的同時，卻致力於建立真正以黨凌駕政府、軍隊和群眾團體的嚴密黨國體制，而這一個黨組織過去長期賦予毛澤東有關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

對外關係方面，中共則宣布向蘇聯一邊倒，高唱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蘇聯的昨天就是中國的今天，要為中國轉變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新國家鋪路，但只是動員群眾徹底消滅國民黨政府內部的所謂「官僚資本」以至被認為是其權力基礎的地主階級，以及所謂「帝

國主義及其走狗」。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不要四面出擊」，對農村富農不搞階級鬥爭，反倒嚴格限制打擊範圍，僅挑戰英美資本主義在華的代理人或合作夥伴、二百萬左右地主，以及幾萬在國民黨或國民黨權貴企業工作的高級職員，同時卻竭盡全力爭取和拉攏這百分之一以外的大多數人口，建立最寬廣的統一戰線。

本書的重點，如編者所說，不是中國高層政治，而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不是中共如何透過土地革命建立其政權基礎，也不是鎮壓反革命或是「三反」、「五反」等群眾運動，而是由學者各自選擇學術關注，撰寫論文，所以整合起來相當困難。最後勉強區分為接收城市、佔領邊陲、改造藝文和學術界，以及家庭因應政治鼎革的策略等四個部分，據以說明中共建國初期國家和社會的互動。

城市以上海為代表，討論中共接收城市以及私營工商業業主、產業工人和私人慈善事業對政策的因應；邊陲不僅指傳統意義下的西藏和新疆，也兼指清代改土歸流的貴州，以及蘇聯紅軍佔領下的港口大連，討論中共的政策以及這些地方的人民如何因應其統治；藝文和學術界則挑選相聲界、古生物學界、電影界和高等教育界為討論對象，其中電影界和高等教育界基本上是個案研究，前者聚焦於舊中國著名的男演員石揮，而後者則專注於根據蘇聯模式和意見建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個別家庭則包括天津一個官宦世家和上海一個大資本家家庭，其成員對中共成立新政權的因應，

以及陝南農村接生文化的改良和現代新接生術的推廣。由於課題新鮮，彼此相關性不大，故以下依先後次序介紹每篇文章，並視情況加入評論。

第一部分「接收城市」(Urban Takeover)中，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和迪倫(Nara Dillon)代表美國老中青三代學者，除強調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寬容和成績以外，他們也都注意到中共建國前後的連續性，以及毛澤東效法史大林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決心；在說明中共新政權帶來的新作風、新氣象、新希望之餘，更指出上海市民對新政權的誤會、迷信和幻想。

魏斐德刻畫中共在毫無抵抗之下如何佔領和接收上海，他們給上海市民的第一印象是樸實、愛民、紀律、清廉、效率。儘管毛澤東一直視城市為罪惡的淵藪，卻無意掀起鋪天蓋地的階級鬥爭，加以徹底毀滅，反而採取打掃乾淨以後重建的策略。因此佔領城市之前，中共先訓練大批接收幹部，佔領城市之後，又像1927年的國民黨一樣，仍以恢復和維持社會秩序為主要考量，對工商業業主全力爭取和拉攏，以便市面和生產早日恢復。

魏斐德又進一步以警察制度為主軸，敘述中共在地下黨員和投誠國民黨官員的配合之下，如何留用絕大部分原有警察，又透過登記清理和思想訓練，鼓勵人民來信，建立警察自我批評制度，以及人民警察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則配合糧票制度和群眾動員，改善國民黨留下來的戶籍管理制度，同時整理和

組織攤販，取締和改造乞丐、妓女、吸毒者，逮捕和消滅扒手、搶犯、流氓、土匪、惡霸、散兵游勇和國民黨特務，以及配合軍隊清剿附近土匪和擾民反共武裝，因此深受群眾歡迎和擁護。

由於政治號召同時也讓中共佔領了道德制高點，中共透過組織建設和群眾參與，採取無限期拘留改造、工會和街道委員會揭發和檢舉、人民法庭審判、群眾參與控訴和鬥爭、「犯人」公開自我批評等便宜行事的方式，一般民眾不但沒有反感，反倒熱烈支持。等到韓戰爆發之後，中共抓住時機，又陸續掀起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三反」、「五反」運動，建立的社會組織更是愈來愈嚴密，而置保障人民大眾權益的法治建設於不聞不問。公民的國群之自由很快遭到侵犯，甚至連人民的小己自由也隨而遭到踐踏。

裴宜理強調，儘管當今中國工人的社會地位極低，但當年工人當家作主的宣傳可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和鼓動力，何況中共佔領上海之初，百業蕭條，工廠停工，很多工人生活陷於絕境，所以在中共接收上海之初，工人抗議行為不僅比國民黨時期頻繁，也愈加激烈。但是中共當局因為害怕抗議行為影響經濟復蘇，所以不時加以壓制，並把所謂「過火」的鬥爭行為歸罪於前國民黨工會人員的滲入，其實這些和前政府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工人究竟是為了爭取同仁切身利益而活動，還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很難說清楚。偶然之間連毛澤東也會給予同情，下令中共在上海的工運幹部退讓。

魏斐德、裴宜理和迪倫代表美國老中青三代學者，他們都注意到中共建國前後的連續性，以及毛澤東效法史大林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決心；在說明中共新政權帶來的新作風、新氣象、新希望之餘，更指出上海市民對新政權的誤會、迷信和幻想。

在筆者看來，趙樸初其實就是上海的章乃器。不同的是，他可能還是中共秘密黨員。筆者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斟酌政治情況以後，故意要他以黨外人物面貌繼續為中共效力；趙樸初在歷經檢舉和批鬥之後，終於了解對中共效忠是他唯一的出路。

至於工人武裝，同樣也有一番曲折的歷史，儘管其自發組成，對防止接收期間的工廠破壞和搬遷，以及逮捕國民黨特務、協助維持社會秩序方面，都有很大功勞，但中共還是藉口其中龍蛇混雜、有不少人是前國民黨工人武裝的積極份子而加以解散。及至鎮壓反革命運動爆發，中共才因為現實需要，再度容許已經改造過的工會重新成立工人自衛武裝，要他們協助逮捕反革命份子和維持鬥爭大會秩序。等到事過境遷，上海當局又認為工會組織對黨鬧獨立，留用太多的國民黨時代舊人，加上軍隊不願意看到另有一股自己不能控制的武力存在，再度下令把工人會糾察隊解散。總之，中共可說是在工人的階級鬥爭和穩定社會秩序之間走鋼索。

迪倫討論上海的私人慈善事業的文章，補充魏斐德和裴宜理的論述，強調中共通權達變。儘管中共視私人慈善事業為資產階級欺騙窮人的迷幻藥，卻在建國之初賡續國民黨的做法，除了改變政府部門的管理機制，並以能夠信賴的民主人士充任領導以外，基本並未做太多干預。但是韓戰爆發以後，上海黨在「反帝國主義」口號之下，發動慈善事業進行自清，後來更透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尤其是其後的「三反」和「五反」運動，嚴重摧毀私人慈善業依為基礎的私營工商業。她採取李侃如(Kenneth Libenthal)的說法，把這幾次運動視為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二次革命，大量動員工人階級，逼迫上海的私人工商業業主「坦白」「行賄、逃漏稅、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資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

罪行，並在大庭廣眾之間接受批鬥，然後根據揭發、控訴、調查和坦白的所謂「罪行」，進行退賠，並課以巨額罰金，使他們陷入破產邊緣，同時更徹底摧毀私人工商業業主的道德性和合法性，從而嚴重弱化了民間慈善團體的經濟基礎。所以中共後來鼓吹公私合營時，私營工商業業主竟然敲鑼打鼓，慶祝資產階級的死亡；同樣，上海的私人慈善事業也在無聲無息中成為毛澤東眼中掃進歷史垃圾堆中的廢物。

此文提及上海慈善界聞人趙樸初，認為他是這一頁歷史的關鍵人物。如果作者對趙樸初個人背景有更進一步的挖掘，可能就容易理解中共是如何消滅民間慈善事業了。她一味強調趙樸初不是中共黨員，卻未注意到趙樸初在1950年2月至1953年6月這段期間曾先後是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副部長、人事部副部長，以及上海市政法委員會主任潘漢年之副手^②，當然也就不會問道：趙樸初怎麼會由潘漢年進行「三反」的主要副手淪落為被調查批鬥的「大老虎」？如果我們知道1952年「三反」期間毛澤東曾命令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組織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的內部鬥爭(同時在交通部內展開對交通部部長章伯鈞的批鬥)，就可能另有解釋了。

當時李維漢指使民建五位骨幹人物——孫啟孟、孫曉村、羅叔章、王新元和田鍾靈對民建領導、國務院政務委員章乃器進行七次批鬥，他們都以為源頭是毛澤東發出的消滅資產階級號召，於是拼命對章乃器進行批鬥。不料章乃器上書毛澤

東，毛澤東反而為章乃器解圍，甚至在章乃器的堅持之下，默許開除前述五人的民建黨籍，並任命章乃器為新設的糧食部部長；章乃器感激涕零，後來毛澤東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需要設計徹頭徹尾違反資本主義原則的糧票制度，章乃器便鞠躬盡瘁了^③。

因此在筆者看來，趙樸初其實就是上海的章乃器。不同的地方是，他可能還是中共秘密黨員。根據中共報導，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跟上海市長陳毅都對他十分相信和尊敬，但是這兩位有權干涉「三反」貪污案審查的國家領導人都任由下級根據所謂「揭發」和「檢舉資料」嚴密審查趙樸初，周恩來只在審查還其公道之後，才盛讚他是稀世「國寶」^④。奇怪的是，趙樸初得到所謂「清白」之後，卻從此不再出任政府要職，而專門從事統戰和佛教工作。因此筆者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斟酌政治情況以後，故意作此安排，要他以黨外人物面貌繼續為中共效力；趙樸初在歷經檢舉和批鬥之後，也終於了解對中共效忠是他唯一的出路，從此以後就更死心蹋地為毛澤東和周恩來效勞了。

第二部分「佔領邊陲」(Occupying the Periphery)，四位作者除陳兼外，周杰榮、赫斯(Christian A. Hess)和高崢均為後起之秀。陳兼和高崢論述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和新疆兩塊少數民族地區的經緯，大體重覆前人研究成果，無多新意。只是高崢的文章用了一個很有詩意的主標題「綠洲的召喚」，並強調中共從內地徵募大量女兵，卻在不經意中造成讀者一些誤解。

首先，中共屯墾戍邊，主要在北疆草原和河谷地區，南疆綠洲農業地帶並不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中共改編為新疆建設兵團的是原國民黨軍隊和少數民族三區革命的民族軍，中共入新部隊則仍為國防軍的一部分。作者使用「女兵」這個隱晦的字眼，雖然點出所謂「徵募」乃是為了解決軍官和士兵的婚姻問題，以便漢族落地生根，但並未清楚說明究竟是要解決國民黨「起義」部隊還是中共入新部隊的婚姻問題，反而因為沒有探討招募的實際過程和撮合婚姻的實際情況，混淆人們響應徵募的複雜原因——究竟是因為愛國主義的「綠洲召喚」，還是因為生計所迫或土地革命造成的新歧視所致？僅從註文中可以知道，響應徵募者中還有大批被捕改造的妓女。

又，作者在強調女兵貢獻時，提到中共在1953年計劃徵募十萬婦女到新疆，惟新疆有建設兵團十萬人，另有國防軍三四萬人，不知道這一計劃如何像作者所說的那樣，能一勞永逸解決所有新疆部隊的婚姻問題？從新疆人口結構來看，中共入新以後，漢人所佔比例始終不超過百分之六，不到史大林所建議的三分之一，一直到1959年大饑荒和1962年蘭新鐵路建成之後，新疆漢人才快速增加到比維吾爾族多，而新疆屯墾兵團成員的在地化、認同新疆，更是1990年代鄧小平全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的全新發展。

周杰榮討論貴州，發現共軍在貴州主要是採取大迂迴戰略路過，因為幹部嚴重不足，不得已遂沿用國民黨舊人；也因為兵力嚴重不

高崢使用「女兵」這個隱晦的字眼，雖然點出所謂「徵募」乃是為了解決軍官和士兵的婚姻問題，但並未清楚說明究竟是要解決國民黨「起義」部隊還是中共入新部隊的婚姻問題，混淆人們響應徵募的複雜原因。

赫斯大量使用中蘇共分裂後的中方文獻，可能矯枉過正。他過份強調中蘇共之間的摩擦，就很難說明，中共如何在蘇聯佔領軍的協助之下，使大連砲彈和人力成為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足，加之徵糧比國民黨更繁苛，而又不問已否繳納糧食，故到處激起民怨，烽煙四起。其實作者發現的民間反抗武裝也在西北、東北、東南和新疆出現，只是情況不如貴州嚴重罷了。這些反對武裝的起事動機相當複雜，缺乏統一指揮，尤其缺乏積極政策和有效執行，很難成為嚴重挑戰。因此中共回師貴州以後，降低農村稅賦和展開武裝鎮壓，雙管齊下，問題立即解決大半。但韓戰爆發之後，中共藉口反共武裝和美軍裏應外合，鎮壓手段更加血腥恐怖，所以貴州很快趨於平靜。

韓國戰場則提供中共處理被俘反共武裝農民的管道。作者敘述一位俘虜兵在韓戰場上成為戰鬥英雄，獲毛澤東親自接見，回到老家卻發現妻子已另投懷抱，於是精神崩潰，被送進精神病院治療。作者刻意強調內戰和湘西鎮壓反革命的慘酷、韓國戰場火海的懾人魂魄，以及因不斷改變效忠對象而在內心產生的焦慮，終於壓垮這位戰鬥英雄，接着他不經意評論道，韓戰中國戰俘回到祖國以後，跟這位俘虜「兵」一樣，有嚴重的心理創傷，卻完全未提到，其他大部分戰俘返回祖國以後適應困難，根本原因乃在國家不斷懷疑他們對祖國的忠誠，甚至指控他們為叛徒，以致他們無法在親友故舊面前抬頭挺胸做人。

赫斯探討蘇聯佔領下大連的中蘇關係，文章主標題是「老大哥在監視」，用語貼切。大連商港及其附近的旅順軍港是1945年國民黨政府在美蘇「雅爾達密約」壓迫下租借給蘇聯的，根據雙方條約，蘇聯進

佔大連以後應協助國民黨建立文人政府，統理當地中國民眾，實際上它卻協助中共取得真正控制權，直到1949年國共內戰告一段落，此一秘密才得以公開。作者強調蘇聯佔領軍和中共地下政府之間從一開始就衝突不斷；中共幹部不滿蘇軍強姦中國女性、搬遷日本工廠設備，尤其不滿蘇軍制止其鬥爭地主、漢奸、包工頭和反革命份子，拉攏私營工商業業主，蘇軍則斥責中共清算鬥爭，破壞生產秩序，不尊重其權威，到1947年，更公開向中共攤牌。中共中央在了解蘇軍的立場後，決定全面讓步，調走蘇軍最不满意的大連副書記劉順元等三人，並採取兩國關係以蘇聯為主的政策。

對中蘇雙方之間的衝突，作者的解釋是，蘇聯佔領軍強調大連工業和貿易的恢復，重視社會秩序，而中共幹部習慣於農村的群眾動員，認為蘇聯畢竟是外國人，不應喧賓奪主。中共中央決定兩黨關係以蘇聯意見為主以後，停止群眾參與式的清算鬥爭，強調法庭審判和警察監視，並通過中蘇友好協會的各種宣傳活動，改變人民對蘇軍的不良印象，尤其是要求幹部尊重蘇聯佔領軍的政治特權，學習其管理城市和發展工業的經驗，使大連成為未來中國的驕傲。作者清楚證明，不管中蘇共上層如何水乳交融，中下層的幹部之間因為革命經驗或民族情感等關係，並未像早期中共宣傳一樣相處和諧，因此要靠中共中央決策和中蘇友好協會的宣傳，才能把雙方關係導引至彼此雙贏的局面。作者承認他這樣描寫中蘇共在大連的關係，是大量使用中

蘇共分裂後的中方文獻所致，可能矯枉過正。確實也是如此，過份強調中蘇共之間的摩擦，就很難說明，中共如何在蘇聯佔領軍的協助之下，使大連砲彈和人力成為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的標題是“Culture of Accommodation”，殊難翻譯，勉強可譯為「適應政治環境的文化」，也有四篇文章。前三篇主旨都是「我本將心對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苦戀」故事。知識份子滿腔熱血效忠新中國，豈知新中國並未當他們是自己人，仍然要不斷加以改造批鬥。

在中共建國之初，相聲因為中共的關注和提攜，從下里巴人的娛樂變成可以登上劇場表演的作品，不僅行業的聲望大為提高，演員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國家尊重，中共更動員老舍等作家為相聲演員寫劇本，減少甚至清除其中淫穢色情和歧視殘障的部分，代之以服務社會和政治的新內容，因此林培瑞(Perry Link)以相輔相成、有互生關係的水鳥和鱷魚分別比喻相聲界和中共，兩者相得而益彰。但後來中共因為不了解干預相聲寫作的限度，尤其是相聲本來的吸引力就是諷刺社會光怪陸離的現象，而一定要將其改良為按照官方意旨為政治服務的東西，歌頌新社會，結果不僅使早期的改良成果化為泡影，也害得相聲喪失其生命力。1957年相聲作家何遲成為右派份子就強力說明了這個隱藏在中共和相聲共生關係中對民間曲藝發展不利的因素，但在此之前，相聲演員只看到政府提攜，包括作家老舍為服務新中國，

或為了改良相聲形象和相聲內容所作的努力，從而更加認同新中國。林培瑞這篇文章敘述的雖然只是相聲界，其實也說明了民間曲藝甚至文藝美術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命運。

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接着指出，中共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建國以後立即透過各種思想訓練和各種文藝媒體鼓吹被認為是真理的馬克思主義基本教條，尤其是唯物主義思想和歷史進化論。中共認為科學和宗教互為敵體，宗教也是一種迷信，防礙中國現代化的進行。在建國初期，中共還會容忍一些不具威脅性的異己份子，所以天主教神父可以留在中國教書，而基督教徒也可以出版有關上帝造人的書籍。一旦韓戰爆發，中共就不再容忍了，對不符合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的出版物，就立即以「為帝國主義作偽」的罪名，大肆聲討。

作者全文最想強調的是，中共反對宗教和迷信，許多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家有志一同，其實國民黨內也有類似的主張，這些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者無意之中成為中共宣傳的有力台柱，以其豐富學識和化石證據，熱烈投入中共掃除迷信和反對宗教的工作，不料，在為中共建立唯物主義的思想霸權道路上清除最大的路障後不久，中共便嚴格審查他們的著作，針對其中不符合意識形態的觀點進行批判和壓制。國民黨時期上海暨南大學人類學教授劉咸就是一個例子。他大力協助新政權進行反宗教和反迷信的宣傳，並協助建立復旦大學人類學系，但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認為他的著作主張「人(智慧)發

林培瑞以相輔相成、有互生關係的水鳥和鱷魚分別比喻相聲界和中共，兩者相得而益彰。但後來中共因為不了解干預相聲寫作的限度，而一定要將其改良為按照官方意旨為政治服務的東西，結果不僅使早期的改良成果化為泡影，也害得相聲喪失其生命力。

李濱對老幹部和青年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並無具體討論，對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出路也點到為止，不知道中國人民大學究竟為中共訓練了多少管理政府和經濟的人才，只知道中共在1955年前後放棄了立即培養大批工農學生上大學的構想。

明勞動」說，背離恩格斯「勞動創造人」的論斷，故予以嚴厲批判，並下令書店把他的有關書籍全部下架。同時，中共又干預劉咸的研究生生活，後來更將其打為右派份子，不准教書，下放到圖書館，監督勞動改造。在中共建立思想霸權的過程中，作者強調考古人類學者的大力協助，中共借助他們的專業知識，有意無意地強調五十萬年前北京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的血緣關係，以及「北京」頭蓋骨在美國海軍協助運輸時不知下落的事實，以加強中國人的國家和民族認同。

第三篇論文的作者是本書編者畢克偉，主角則是1930和40年代中國的「話劇皇帝」和王牌電影男明星石揮，作者以其1949年以後的生涯說明私營電影界的一般情況。石揮出身貧寒，同情窮困，為人高倣好強，講話則有點尖酸刻薄，因為對國民黨統治大失所望，故對新政權大懷好感，在中共佔領上海以後即盡力參加中共號召的各種活動，並



「話劇皇帝」石揮

千方百計改造自己，然而不論他在私營的文華電影公司如何努力為新中國拍製影片，也不論他如何全力以赴扮演甚麼角色——為人溫情的北京警察、講究老式做人道理的浙江裁縫、熱血滿腔的愛國青年、虐待妓女的皮條客、愛民愛兵的山東土八路連長或唯利是圖的美國資本家角色，都因為他不能符合文藝黨官所要求的好人全好、壞人全壞標準，總是招惹嚴厲批評，甚至被迫在群眾大會上坦白反省。隨着私營電影業的消失，他更加感覺有志難伸。

1956年，他以為毛澤東真的邀請知識份子幫助黨員整風，乘機批評文藝官僚過度干預電影，甚至設法拍製《霧海夜航》(1957)新片，批判「民主三號」客輪因為外行領導內行，瞎指揮，幾乎傾覆。不料他卻因此而在次年年底被打成右派份子，二度勒令在大庭廣眾之前自我批評，傷心失望之餘，他搭乘「民主三號」跳海自殺。此前他在《美國之窗》(1952)這部電影中批評資本主義逼人走上自殺絕路，沒想到自己四十三歲正是春秋鼎盛的年齡，卻也只能選擇以自殺了其一生。

第四篇文章為李濱(Douglas A. Stiffler)討論蘇聯式的中國人民大學的建立。由於全文重點在學生背景的分析，枯燥反覆，故比較不易閱讀。其內容是中共在建國以後，立即請求蘇聯派遣顧問協助創立第一所蘇式大學，這所蘇式大學強調學生的階級背景，以訓練和培養工農階級幹部管理蘇式政府和工廠的人才為目的。學校一開始就面臨兩難，如果堅持只招訓工農出身的老幹部(「老」不是指年齡，而是指資

歷而言)，就必須面對他們程度實在低落的現實，他們大多數連初中大門都沒進過，學習動機不強，殊難訓練成才，更何況這些老幹部的功臣思想濃厚，經過多年辛苦以後，自認為生活應得到改善，很不適應黨的艱苦奮鬥的學習要求。年輕的學員雖然普遍程度較高，一般都是高中畢業，可謂青年知識份子，但是多半出身地主、資本家或是白領階級家庭，向上爬升的學習動機強，然而受舊社會影響，親美觀念也重，不時露出鄙視或仇視蘇聯的論調。學生分成兩個陣營，彼此摩擦，問題甚為嚴重。可惜作者對兩個群體之間的矛盾並無具體討論，對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出路也點到為止，不知道中國人民大學究竟為中共訓練了多少管理政府和經濟的人才，只知道中共在1955年前後終於面對現實，放棄了立即培養大批工農學生上大學的構想。

第四部分「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ies)的作者分別是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賀肅(Gail Hershatter)和高家龍(Sherman Cochran)三位著名學者。乍一看見“Family Strategies”這兩個英文字，還以為是指富貴人家都投資各方面，以免政權一旦出現轉移便隨同滅頂。其實三篇論文中有一篇討論革命對農村傳統接生婆的意義，並未涉及分散風險的觀念；其他兩篇，即便討論家族在國共內戰中的政治選擇，也看不出他們有分散投資風險的家族策略。其中，天津葉家子女分散在各個政治陣營，並不是追求風險分散；而上海資本家劉鴻生派子女到哈佛、劍橋或東京大

學求學，也不是想把風險分散到各國，而是要他們學習幾個最先進國家的科技，並在這些國家建立重要的人際網絡。

先談賀肅的論文。賀肅想要了解革命對農村婦女的意義，討論中共建國以後，如何把現代的接生術傳入農村。她透過口述訪問，發現陝中農村婦女，都在丈夫家裏生育子女，由傳統穩婆協助，採取坐式生產。穩婆技術落後，尤其不講衛生，所以婦女產後常得產褥熱，而嬰兒則因為臍帶處置不當或其他原因，也常得破傷風，死亡率高達四成。中共建國以後，土地革命尚未進行，衛生部和婦女協會便已通力合作，調查傳統接生術，介紹和訓練新式接生術，他們採取的策略不是撻伐傳統穩婆，而是對之重新加以訓練，其實這就是國民政府在其統治期間的做法，只是國民政府的努力限於城市地區，中共卻在廣大農村大力推廣新式助產術，結果不論嬰兒和產婦的死亡率都大幅下降。關於這種新式助產術，中共在農業集體化時期廣設接生站，以及表揚助產婦樣版，都有助於全面推廣。過去學者談論中國建國之初人口的大量膨脹，都只注意到戰爭之後的恢復和土地革命改善生活的效果，完全忽視新式助產術的推廣，本文則在這方面有所貢獻。不過作者也發現，傳統的觀念有如百足之蟲，就是現在仍有農民視接生為充滿血污和危險的行業，甚至還有模範接生婆暗中相信自己曾經到冥界幫死婦助產。

周錫瑞和高家龍討論的都是有名家庭，故事相當吸引人，但是細

過去學者談論中國建國之初人口的大量膨脹，都只注意到戰爭之後的恢復和土地革命改善生活的效果，但賀肅注意到新式助產術的推廣。不過她也發現現在仍有農民視接生為充滿血污和危險的行業。

周錫瑞筆下的天津葉家全家都效忠於中共新政權，並想在中共政權統治之下一展抱負。周錫瑞特別注意政治如何介入家庭生活，延安經驗培養堅強無比的黨性，因此葉家兩位高幹兄弟在處理家庭和親情問題時，似乎總以對黨忠誠為第一考慮。

節偶而啟人疑竇。周錫瑞筆下的天津葉家八兄弟和四姐妹(同父異母)，在內戰結束之前分別在淪陷區、國民黨區和中共統治區生活，其中有銀行家、民主人士、留日學者、留美學者、中共中高級幹部、相聲演員、純粹家庭主婦等。其中兩位兄弟因為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投奔延安，經過延安整風考驗，在1953年分別擔任東北地區黨校副校長和新華社總分社社長。他們在淪陷區銀行界的大哥聆聽劉少奇安撫資本家的講話後留在天津，兩位在國民黨地區從事民主運動的兄弟則相繼投效中共政府，一位斷絕家庭關係從事相聲表演的兄弟也因為中共對民間曲藝的支持而在重慶感到備受尊重，另一位甫獲美國大氣物理博士學位的兄弟更在韓戰爆發後冒險返抵中國國門。他們全家都效忠於中共新政權，並想在中共政權統治之下一展抱負。他們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來看，大都屬於中上級家庭，周錫瑞描寫他們的事業、家庭、婚姻和子女成長與教育過程，尤其對比有八個小孩的黨校副校長和人口簡單的非黨科學研究員家庭，提供兩類家庭撫育子女成長的細節，相當有趣。周錫瑞特別注意政治如何介入家庭生活，延安經驗培養堅強無比的黨性，因此兩位高幹兄弟在處理家庭和親情問題時，似乎總以對黨忠誠為第一考慮。

周錫瑞對中共審查幹部之嚴厲有很好的描述，他詳述葉家一位跟國、共、美國、法國和俄國情報機構都有過關係的兄弟如何蒙受被指為特務和叛徒的不白之冤，對安全單位把他和美國親共作家裴克

(Graham Peck)的交往作為美帝特務證據，十分耿耿於懷。可惜的是，周錫瑞沒有機會同樣仔細地探討另一位兄弟的雷同經驗，也就是這位兄弟在延安被搶救幽囚兩年的經過。這位有豐富延安經驗的兄弟九死而不悔，始終為中共黨國體制效力，曾為子虛烏有的美國細菌戰作證，後來到北京成為專門編輯負責高級幹部才看得到《內部參考》的高幹，目前卻是強調實事求是的《炎黃春秋》歷史雜誌台柱。他的心路歷程，令人十分好奇。

這裏補上一個有趣的事實，周錫瑞對表演相聲小弟的描寫，呼應林培瑞所說相聲演員社會地位變化的說法，指出他在中共提倡民間曲藝的政策之下曾有一段揚眉吐氣的日子，可是因為早年被大哥登報斷絕關係，故不敢與其他兄弟聯絡。其實如周錫瑞在文章中所說，在眾生平等的新中國，省黨委書記會因為發現大學同學只是新華社高級記者而停止來往，而葉家這位小弟更是因為自己的社會地位依舊不高，不敢回北方認親，而且早在1958年便因為不明理由被打為右派份子，並沒有繼續享受中共的重視；他要到1980年代初得到平反後，才敢回到北京會見同樣遭到政治打擊的其他所有兄弟^⑤。

高家龍討論上海「火柴大王」劉鴻生家在中共新政權建立前後的政治選擇。他的問題意識是，劉鴻生到底是像有些資本家一樣，因為毛澤東所說的愛國主義而從香港返回上海，還是像另外一些資本家一樣，有跨國主義意識，想分散風險，所以在國外已有安排之後，自

己回到上海應付新政權？高家龍的結論是兩者都不是。劉鴻生本來有意到台灣發展，但因為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和國民黨的金元券改革，而對自己工廠遷台的計劃開始三思。他有兩個兒子思想左傾，發現中共接管上海後秩序井然，官員清廉，就勸說老父回歸，共產黨代表則保證優待，甚至連周恩來也不顧其曾經擔任英資開灤煤礦經紀人和國民政府國營事業招商局總經理的事實，告訴他中共將他定性為不同於官僚或買辦資本家的民族資本家，劉鴻生感恩圖報之餘，又有現實生活的考慮，所以終於決定返回中國大陸。

他回到上海以後，耳聞目睹又加深了他對中共新政權的認同，於是改變以前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的策略，督促所有在國外的子嗣返回上海，並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領導資本家捐獻大量金錢。不料「三反」和「五反」運動爆發，他遭到殘酷批鬥，所幸中共在調查後還其公道，不僅將他歸類為基本守法戶，還給予「模範資本家」的稱譽，除得到250萬元貸款和280萬元現貨以紓困外，更得到毛澤東親自接見，躋身於國家級民族資本家代表的行列。所以毛澤東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後，他率先響應公私合營的政策，雖然他對已經定居台灣的兩個兒子沒有辦法，但千方百計把留在香港的八兒騙回中國大陸，以符合模範資本家的令名，並享受子女在身邊的天倫之樂。

高家龍對「五反」運動之前的描寫大都合情合理，但他對劉鴻生在「五反」運動之中如何在工人職員控

訴、家屬勸告、其他資本家檢舉、財稅幹部查賬等壓力之下，俯首認罪，坦白有巨額逃稅和漏稅罪行的經過，卻無任何具體說明，可能因此之故，他對劉鴻生在「五反」運動中的心理狀態缺乏深入探討，反而輕易相信他和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六兒合謀把八兒從香港騙回中國大陸。高家龍也相信劉鴻生既然是第一個公开发言支持中共反逃漏稅和其他經濟犯罪的法律，強調誠信乃商人的第一生命的資本家，所以中共相信他是守法的，殊不知劉鴻生在「五反」運動中的壓力下坦白出來的逃漏稅數目，高達數百萬元新人民幣之多，除「紅色資本家」榮毅仁以外並無第二人可比，難怪在他的認罪帶動上海資本家坦白以後，中共會宣布他是基本守法戶，又協助他個人的企業度過經濟難關，他因此對中共更是感激涕零^⑥。

高家龍進而相信，中共號召公私合營，劉鴻生是志願大力響應，卻不知「五反」形勢依舊逼人，毛澤東軟硬兼施，核定劉鴻生資產時，格外寬厚，定為2,000萬人民幣，依法享受定息5厘，於是僅利息每年收入便高達百萬人民幣。當時毛澤東年薪不超過5,000元，大學教授每月最高待遇也不過400元，劉鴻生當時已經可以享受抗戰前大學教授家才有的大宅，女傭、廚師和三輪車夫待遇，面對比這個更優厚的條件，又怎麼會以卵擊石，堅持與中共正面相抗呢？劉鴻生六兒以母親病危騙八兒回國，火車抵達深圳羅湖車站以後立即吐實以告，當時老八不敢置信，手提行李箱摔落月台，撲地大哭，高家龍為何不

高家龍對「五反」運動之前的描寫大都合情合理，但他對劉鴻生在「五反」運動之中如何在壓力之下俯首認罪，坦白有巨額逃稅和漏稅罪行的經過，卻無任何具體說明，可能因此之故，他對劉鴻生在「五反」運動中的心理狀態缺乏深入探討。

這本書沒有提到，中共佔領城市以後，為了恢復經濟，最初繼續農村高榨取政策，這也是大多數城市居民擁護中共新政權的物質基礎。顯然很少中國人會看到新政權光鮮亮麗外表後面的陰影，更沒有人能正確評估毛澤東要效法史大林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心。

懷疑他六哥是暗奉中共嚴令騙他回上海，而堅信劉鴻生是設計騙局的主謀呢？

作者給人的印象是，劉鴻生帶着中國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覺悟而含笑離開人世，筆者寧願相信，他是在公私合營過程和兒子被騙回國的雙重煎熬中含恨前往九泉。劉鴻生白手起家，建立他自己的企業王國，但畢竟不是榮毅仁。榮毅仁是小老婆的兒子，在榮家企業從未進入權力核心，加上又是地下黨員，對黨宣誓過效忠；相形之下，劉鴻生熱愛中國，但懷疑共產黨，他在中共的全力爭取之下，回到中國大陸，然而「三反」和「五反」運動終於讓他了解私人資本家在紅色中國已無立錐之地，群眾的壓力加上黨組織的勸誘，逼他違心坦白出可謂罄竹難書的「五毒」行為，並自動把辛苦積累的全部財產交給中共接管，其實他的內心深處可能充滿後悔和怨恨。

這本書沒有提到，中共佔領城市以後，為了恢復經濟，最初繼續農村高榨取政策，要農村負擔20%以上的國家經費（稅賦重擔放在農村的地主和富農階級身上），這也是大多數城市居民擁護中共新政權的物質基礎。無論城市居民是衷心擁護或是出自其他動機，顯然很少中國人會看到新政權光鮮亮麗外表後面的陰影，更沒有人能正確評估毛澤東要效法史大林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心。

中共在其所謂群眾和知識份子的熱烈支持下締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龐大而有效率的組織，似乎沒人記得嚴復翻譯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一書曾針對君主專制提出過這樣的警告：「凡人有權，其不倒行逆施者亦鮮矣。」中國人民協助建立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新黨國體制，高度中央集權，神經末梢無遠弗屆，而毛澤東位居紫微，大權獨攬，還有人民信仰和膜拜，當時有誰會想到，他有朝一日也可能犯錯，並濫用中國人民對他的擁護和信賴。孟德斯鳩又說：「雖行其德，不可不為限制」，也沒有人注意這個權力組織，以道德為號召，結果因為為權力不受法治限制和制度制衡，終於導致中國後來國群自由之喪失^⑦。毛澤東根據其所謂「馬列主義科學真理階級鬥爭」的理論，動員群眾參與，而為滿足群眾對司法正義、報復仇恨和劇情張力的渴望，默許甚或縱容辱罵、偽證、攻訐、暴力、血腥和殺人示眾。另一方面，大多數人民認為中共打擊者是道德意義上的壞人，所以即便採取的方法逾越了法治建設的基本原則，侵犯小己之自由，也對之視若無睹，給予掌聲，以致國群之自由隨而遭受無理壓縮。

中共耗費無數人力締造廣大而綿密的黨國體制，其目的本來就在動員各種資源，以便在不久的未來進一步以俄為師、以史大林為師建設和改造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天堂，群眾或知識份子不會想到，天堂不可能容忍不同政治立場的爭鳴，更不可能容忍私有經濟的存在。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現在正確、因此過去也一定正確、將來更會一貫正確，所以許多知識份子自動自發接受中共思想改造的號召，

以對國家和社會無私貢獻為偉大道德情操。所以當中國共產黨決定終結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時，資產階級對其改造個人和消滅階級的政策大感驚訝，竟然不知道資產階級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早已在忙於自清改造的過程中消蝕殆盡，反而因為中共已經布下天羅地網的組織，有一大群工人和店員組織為其效力，所以只能接受綁架，敲鑼打鼓歡迎中共宣布其階級的死亡。

由於中共採取擴大同情者的政策，無論是城市的私營工商業業主還是邊疆的少數民族，還是對馬列和史大林主義認識不足的知識份子，都願意支持新政權，只是沒有想到政治形勢的變化極快，所以一旦中共決定根據史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全面改造中國時，他們立即遭到中共已經建立和鞏固的統治體制之壓制，成為歷史祭品。這一個黨國體制的建立及其群眾動員手法，雖然不一定導致後來的一連串大災難——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但正如本書編者在導論中所說，災難的種子在建國之初已經播下。毛澤東建國之初的黃金時期，由於黨國體制的建立和階級鬥爭的動員，獲得驚人的成就，後來不斷想故伎重施，中國人民終於在劫難逃了（頁11）。

這本大書的兩位編輯，花了不少功夫。導論言簡意賅，引人入勝。各篇文章雖然有一些文字和史實小疏漏，值得指出，卻無傷大雅。譬如頁24，說共軍將領陳賡曾在中共特務部門工作，熟悉上海環境，故被派往上海，擔任公安局

局長，卻忘記指出，陳賡當時為二野第四兵團司令兼政委，正準備率軍渡江攻打南昌，事實上他也從不曾真正出任上海新職。頁25，「銅陵」譯作“Dongling”，「鎮江」譯作“Jinjiang”，同頁，四個野戰軍都參加渡江戰役也是誤說。蓋此次戰役由二、三野負責，四野有一部分參加，一野則因為遠在西北，故不可能出現在長江兩岸。頁60、63、70，再三誤稱新四軍接收上海，其實新四軍的番號當時已不存在，負責接收上海的部隊是前身為新四軍的三野。頁185，視南疆塔里木盆地為印度文化影響最深的地方，其實共軍入新時，當地印度文化的影響早已蕩然無存。頁186，強調盛世才內附以後，依舊是「漢人軍閥」掌權，可是後來掌權的朱紹良、張治中、麥斯武德和包爾漢都不可用此一名詞形容。頁194，提到1932年國民黨軍焚毀塔里木西邊的一座城鎮，惟國民黨軍的力量當時尚未抵達該地。頁279，影片《關連長》（*Company Commander*, 1951）譯為 *Platoon Commander Guan*。同頁說武訓是十九世紀中葉知識份子，其實武訓是大字不識幾個的乞丐。頁288，說劉少奇是副總理，其實他是黨副主席和國家副主席，這點萬萬不可弄錯。同頁把「三反」中的「反官僚主義」，譯為“anti-bureaucracy”，混淆官僚組織和官僚主義，“anti-bureaucracy”哪能等同於“anti-bureaucratism”？頁235，古人類學家賈蘭坡說，「解放後不僅我們翻了身，連我們祖宗的北京人也翻了身。」「翻了身」是民間俚語，殊難翻譯，譯為“transformed

中共黨國體制的建立及其群眾動員手法，雖然不一定導致後來的一連串大災難，但災難的種子在建國之初已經播下。毛澤東建國之初的黃金時期，由於黨國體制的建立和階級鬥爭的動員，獲得驚人的成就，後來不斷想故伎重施，中國人民終於在劫難逃了。

in revolution”距原意甚遠，若譯為“became emancipated”似乎比較妥當。頁317，以「漢人軍閥」形容天津葉家女姻親徐世昌，相當不妥，因為徐在北洋軍閥時代當過總統，卻不曾有人把他歸類為軍閥。頁313，提到葉家某位兄弟在「三反」運動中受到批評，拒絕政治學習，反而沉湎於《儒林外史》的閱讀。作者用官員偽善和官府失職來形容此書，不如用諷刺科舉制度下中國士人的無恥為準確；如此形容，則難以理解主持批鬥的黨官何以反應激烈，更加兇暴。頁383，資本家劉鴻生在公私合營後可以支領5厘利息，這個利息在中共的語言中是帶有剝削性質的，譯為“pension”（年金），全無負面意義，更可能誤導讀者。

以上這些錯誤都不會影響全書的信實可靠，更不會影響全書的容易閱讀，卻令講究正確史實的歷史學究感覺不安，也令筆者想到編輯工作之艱難——稍微不注意或不立即加以修改，就可能「將錯就錯」，得不慎哉！願與這本書的兩位編者共勉之。

註釋

① 何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簡而言之，就是有如中共五星紅旗上的五顆黃星所象徵，大黃星的中共，右側兩顆小黃星的工人和農民階級，聯合另外兩顆小黃星象徵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共同組成的新社會。又何謂「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改造民族資產階級中個人和小資產階級中個人的另一個新社會。

② 參見〈趙樸初簡歷〉，[http://web.peopledaily.com.cn/leader/](http://web.peopledaily.com.cn/leader/za/c1071.html)

[za/c1071.html](http://web.peopledaily.com.cn/leader/za/c1071.html)。中共在1952年8月才成立上海市政法委員會，變成黨組織的一部分。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五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430。

③ 張林冬口述，曉葉整理：《蒼天有情》（無出版地點，2000），頁158、166-67。其中王新元、孫曉村擁有中共黨籍，田鍾靈則在抗議對他的整風批鬥下私自離開延安後前往重慶，此時正在爭取恢復中共黨籍。他們批評章乃器反對周恩來指示，猶自堅持民建要在大中工商業者中發展，並提出「紅色資產階級」的觀念，模糊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章乃器在「三反」之後，當然也就放棄了這些原來的政治見解。

④ 參見趙樸初官方網站，「趙樸初簡介」，<http://artist.artxun.com/13045-zhaopuchu/jianjie>；〈周恩來：趙樸初是國家的寶貝〉，光明網，www.gmw.cn/content/2010-05/21/content_1127402.htm。

⑤ 孫引南：〈一個相聲演員的今與昔〉，中華相聲網，www.xiangsheng.org/asp/html/2005/10/20051027133603-1.htm。

⑥ 劉鴻生原來退賠600萬元，後來減為200萬元。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639。

⑦ 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著，嚴復譯述：《孟德斯鳩法意》（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不詳），第11卷，第4章，頁3。孟氏所謂「國群之自由」指的是：「凡法之所不禁，則吾皆有其得為之權利。」（第11卷，第3章，頁2）其前提是國家要有法度，「集體」不可為所欲為，任何人也不可以有超越法度任意而為的權利。

陳永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